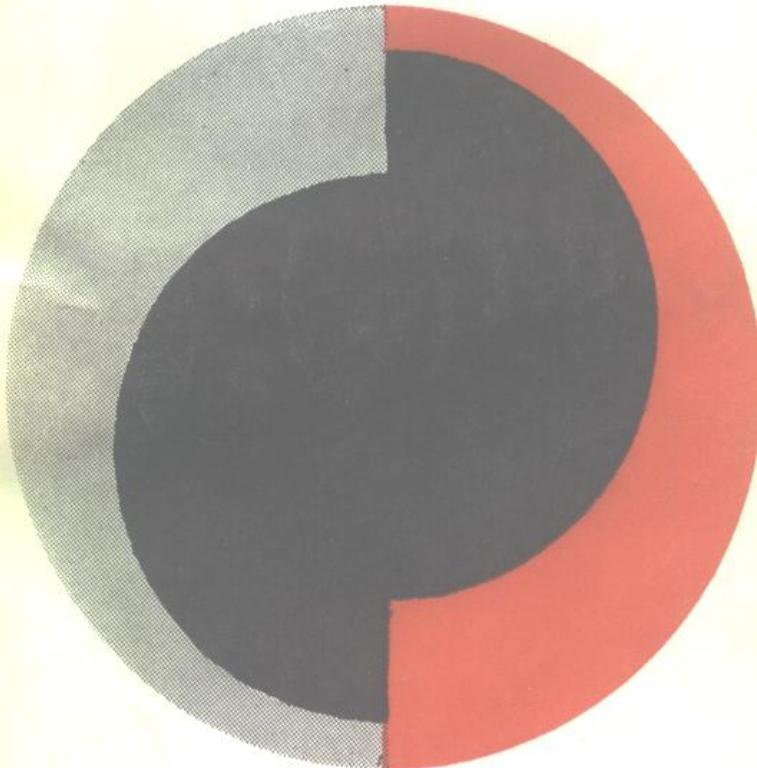


腐败：

货币与权力的交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



CPPH

中国青年出版社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

中国展望出版社

一九八九年五月

腐败：货币与权力的交换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编辑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北京海淀区跃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5.25 字数114千

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89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0

ISBN7-5050-0555-3/F·256 定价：1.90元

序　　言

当前，我国人民最关心的问题是：近年来“官倒腐败”行为的蔓延，已经到了危及民族生存的地步。面对着日益深化的危机，不乏仁人志士满怀义愤发出了挽救民族危亡的呼唤。但是，仅仅有义愤充其量只能造就慷慨悲歌的诗人，而为了解决问题还必须有冷静和科学的思考，深刻剖析所有那些弊病的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社会的根源，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治愈这几千年延续下来的痼疾。

为了帮助人们分析腐败现象的实质和根源，探索铲除腐败行为的途径，我们把近年来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和其他刊物上发表的有关分析产生腐败和官倒的原因、以及治理方法的文章汇编成册，供大家研究参考。本书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我国腐败现象产生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和如何实现廉政建设的政策建议。第二部分是关于寻租理论的介绍，包括寻租的概念、寻租理论的代表作、对付寻租者的方法、寻租理论的现实意义等。第三部分是实证分析，其中主要是对英法两国重商主义时期以及现代印度等南亚国家腐败现象的分析，这些分析反映出寻租社会中贪污官倒盛行的情况，说明只有从寻租社会转到现代市场制度和民主制，才能消除贪污官倒产生的制度性原因，以及在这种转变面临的各种选择。

这样编排是为了文章分类方便。在阅读时也可以不按这个次序，先读理论部分或先读实证分析部分。本书贯穿的基本线索是用现代政治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来解释各国在现代过程中贪污腐败的根源，从而揭示消除腐败的根本道路，为我国进行经济政治体制改革提供借鉴。

对于寻租理论，我国广大读者会感到比较陌生。其实，对寻租这种现象的分析，在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中都可以看到：前者批评东印度公司利用英王授予的特权，贩卖鸦片，牟取暴利；后者则批评帝国主义时代垄断集团利用垄断地位谋取超额利润；在中国，正是共产党人高举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即封建的、买办的国家垄断的资本主义的大旗，才取得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在现代寻租理论中，一切利用行政权力大发横财的行为都被称为寻租活动。比较难理解的是租金这一概念，这里，我们千万别把它同地主收取的地租以及房租混为一谈，在寻租理论中，租金是泛指政府干预或行政管制市场竞争而形成的级差收入，即超过机会成本的差价。一切商品经济中的行政管制，都会创造出这种差价收入，即寻租者趋之若鹜、竞相争夺的租金。因此，这种理论就具有更广泛的适用性，既可以解释历史上重商主义、帝国主义、官僚主义等等的弊端，又可以解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对市场的干预，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的管制而产生的种种弊端。对我们更有意义的是，在传统社会主义经济模式中，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可避免地产生某些寻租现象，如果对这种体制的改革措施不当，改革顺序失误，既实现了经济的部分货币化和商品化，又保留着大量的行政干预、行政特权、行政管

制，形成了价格及其他方面的“双轨制”，那么，这种寻租现象还会恶性发展。因此，有了寻租理论，我们可以从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的更广阔的视野来认识我国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所面临的任务。

我们用寻租理论可以从制度上说明某些发展中国家政治家和行政官员贪污盛行和工商界不法行为猖獗的原因。在这些国家，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开展反贪污运动，建立监察机构，惩治一些下级官员，偶尔也有一位部长被迫辞职，但是，无情的事实是贪污腐化愈来愈严重，它导致人心涣散，对政府不信任，政治不稳定，并为军事专制政府上台铺平道路，但新政府不能消除贪污腐败，又遭到同样的下场。这里根本的问题在于政府对企业进行管制，大大增加了官员决策权的范围，而企业不得不向官员行贿，以求得官员的批准和认可，而随之而来的贪污蔓延使官员对保持这种权力有直接的利益，更不肯放弃对企业的管制。“于是贪污腐化进入了一个有因果联系的循环圈”（见本书第115页）。用寻租理论来说，这个循环圈就是：行政机构对市场的干预，产生了租金；企业为了寻求租金，向官员行贿；从租金得利的官商既得利益者力求保持原有租金制度和设立新的租金制度，扩大租金的规模，贪污腐败现象更为严重。因此，不改变这种寻租的因果链，就不能打破贪污腐化的循环圈。

寻租和贪污腐败之间的密切联系由本书收集的英法两国的比较研究材料得到完全的证实，在英国，经历了垄断和反垄断的长期斗争，1641年，议会彻底剥夺了自古以来国王对关税的全部特权，并且把英国国王查理一世送上了断头台。与此同时，竞争性市场迅速形成，工业在竞争中不断壮大，对

所有商人来说，自由竞争的实际收益已经开始超过保护主义时期寻租活动的实际收益。于是，在民主政体的倡导下，这种自由经济机制终于开始在英国土壤上扩展起来。相反，在从13世纪到18世纪长达500多年的时间内，法国君主和贵族、教士、各省的封疆大吏共享租金特权，从法国君主开始的贪污自然而然地蔓延到社会最基层的官员，法国专制制度保护下的这一切使得法国寻租社会的转轨至少比英国晚了200多年。

印度等南亚地区更是这方面的突出例子。所谓印度病，实际上就是寻租病引起的贪污腐化病。尽管印度实行私有制，采用英国议会民主的形式，但实际上奉行的是甘地的国家慈父主义和尼赫鲁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工业、外贸、农业、就业等各方面实行管制，平等竞争的市场没有形成，市场经济刺激遭到全面扭曲，个人的劳动努力和报酬没有直接的关系，迫使各行各业和各个领域都在寻求租金，谁掌握权力，谁就索取贿金，贿金成了行政机构的运转费。

本书还提供了寻租社会转轨的两种模式。在《非民主制度下经济现代化的条件》一文中对这两种模式作了比较。一种是西方模式，即政治发展同步于、甚至提前于经济发展。另一种是东亚模式即在非民主制下促进市场的发育和成长，后一种道路也不乏成功的例证，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1、工商业经济活动的独立性，2、非直接民选的政府官员系统的非政治化和专业化；3、知识专长不依附于政治权力而独立。寻租社会的根本特点是权力和金钱的交换。有了权，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要改变寻租社会的轨迹，消除贪污腐败的体制性原因，就必须把政治权力和市场活动彻底分开，官员的俸给和提升将取决于他们为公众服务，提供所谓公共财的好坏。西方经济学所说的公共财主要

包括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电力、交通、运河、公路等公共设施的建设，二是保障国家安全，制定和贯彻法律的公共服务。而经济单位的收益和从业人员的报酬则取决于市场。以上两种模式虽然采取了不同的方式，但殊途同归，都是为了达到以上把权力同金钱分开的目的。

从寻租理论的角度看问题，也许可以使我们对如何克服贪污腐败有一个新的认识。龚育之《对贪污腐败作科学的研究》一文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国建国以来，从“三反”、“五反”到“四清”，甚至我们还可以加上“文化大革命”，即每隔一段时期都要反对贪污和官僚主义，这里有什么规律性呢？在我国历次反贪污运动中都几乎把贪污同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而把资产阶级又同市场联系在一起，在每次反贪污的同时，就要限制商品经济，限制所谓资产阶级法权，结果，愈是使人们“盯住政治这块肥肉”（本书第24页），开展政治斗争。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寻租行为，造成政治不稳定，经济停滞、贪污腐败照旧。

在“文化大革命”后，我们抛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但近几年来，“官倒”，“贪污腐败”愈演愈烈，甚至引起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有些人把这一切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联系起来。吴敬琏《“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等文对此做了有力的反驳和透彻的说明。显然，“以权经商”，众多的“官倒”靠价差、利差、汇差发横财活动之所以发展，决不是来自市场的平等竞争，而是来自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制，使人们可以靠倒卖批件、配额、票证，牟取暴利，并凭借“双轨制价格”，把平价物资高价倒卖，大发其财，这一切都是典型的寻租行为。寻租必然导致某些官员的腐败，腐败又导致

不愿意推进真正的改革和放弃行政管制，从而形成寻租和腐败的循环圈。要摆脱这种循环圈就不能再去管制经济，普遍采用专卖专营、冻结物价的手段，而只能实行政企分开，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开展平等竞争。

可见，当前“官倒”、“贪污”的问题症结在于现行经济体制存在的诸多弊端。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又离不开政治。如果人们寻求用政治冲突、权力斗争的手段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着力于体制的根本改革，就会产生一种危险，使人们重新把眼光盯在政治权力这块肥肉上，这有可能导致我国历史上已演出过多次的悲剧重演。

丁学良在文章中忧心忡忡地指出，如果目前的情况不改变，到本世纪末中国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前景：“一个高度工业化、独立倾向日增的台湾，一个大楼留下，人才和资金都跑光了的香港，一个经济力膨胀，历来盯着辽阔中国国土的野心勃勃的日本，一个个浸染着中国文化、经济表现又都优于中国大陆的东亚邻居，而中国内部则是一代代日益缺乏耐心和盲从性的青年，届时，任何悲剧都可能发生。”（见本书第30页）这并不完全是危言耸听。

显然，避免这种悲剧发生的历史责任，就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双肩。希望这本书有助于有志有识之士冷静思考问题，寻找救国的良策。

荣敬本

1989年5月10日于北京

目 录

序 言 荣敬本 (1)

· 腐败的根源与治理的对策 ·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 吴敬琏 (1)

关于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 [香港] 李南雄 (6)

非民主制度下经济现代化的政治条件 丁学良 (20)

廉政三策 胡和立 (31)

1988年我国部分租金的估算 胡和立 (42)

中国价格改革迟滞与地方保护主义造成的

“寻租社会” [美] 尼·拉迪 (44)

双轨制把中国引向何处 智彦斯 益世 (51)

抑制“官倒” 何祚庥 (58)

· 寻租理论 ·

何谓寻租 (65)

寻求租金和寻求利润 [美] 詹·布坎南 (67)

克鲁格模型与寻租理论 钱颖一 (81)

寻求额外收益和寻求直接非生产性利润 (86)

对付寻租者的办法 [美] 科福兰 科兰德 (88)

寻租理论的现实意义

——经济学家座谈会综述 (104)

• 实证分析

南亚贪污腐败因果谈 [瑞典] 缪尔达尔 (111)

对贪污腐败作科学的研究

——读《南亚贪污腐败因果谈》而想起的

..... 龚育之 (119)

什么是印度病 荣敬本 李 飞 (121)

现代化过程中的主要社会矛盾及其解决方式

..... 郭树清 (136)

从专制到民主

——寻租社会由兴至衰的历史轨迹 毕 焦 (143)

“寻租”理论与我国经济中的 某些消极现象

吴敬琏

美国经济学家N·拉迪在一篇总结中国八年经济改革的论文①中提出，在目前中国国有企业管理体制和财政分成制下的各级政府收入留成，实际上是“寻租社会的政治经济学”中所说的“租金”(rent)。拉迪认为，由于价格改革的迟滞、各级政府行政干预的继续保持和保护主义的强化，当前中国经济中“寻求租金”(rent-seeking，简称“寻租”)的活动十分流行。这种活动使经济效率严重降低。自从拉迪的文章在本刊发表以来，不少读者向我们反映：拉迪提出的问题很富有启发性，希望本刊介绍有关“寻租”的理论文献。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我们在本期杂志上登载了有关“寻租”理论的三篇文章，期望引起进一步的探讨。

“租金”是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学范畴。在经济学的发展历史中，它的外延有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因而人们在现代文献中读到“租金”一词时，往往误以为是指土地的租金——地租，因而感到难以理解。在早期的经济学家那里，“租金”一词的确是专指地租而言的。但是到了近代，例如

①N·拉迪：《中国经济体制再造》，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2期。

在马歇尔那里，租金已经泛指各种生产要素的租金了。在所有这些场合，租金都来源于该种要素的需要提高而供给因种种原因难于增加，从而产生的差价。在现代经济学的国际贸易理论，特别是所谓“公共选择理论”中，租金被进一步用来表示由于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如进口配额、生产许可证发放、物价管制，乃至特定行业从业人员的人数限制等，抑制了竞争，扩大了供求差额，从而形成的差价收入。既然政策干预和行政管制能够创造差价收入，即租金，自然就会有追求这种租金的活动，即寻租活动。寻租活动的特点，是利用合法或非法手段，如游说、疏通、走后门、找后台等，得到占有租金的特权。

有些经济学家把这类活动称作“寻求直接的非生产性^①利润”（DUP）。DUP活动的涵盖面较之“寻租”活动更为宽广。它不仅包括只创造利润而不创造财富的寻租活动，而且包括：旨在促成政治干预和行政管制从而产生租金的活动；旨在逃避现存的管制以取得租金的活动。所有这类活动，都是要耗费社会资源的。从它们只耗费资源而不创造财富的意义上说，是一种浪费。既然这种浪费源于行政管制，避免浪费的最有效的办法自然是解除管制（deregulation），实现市场自由化。但在现代经济中，行政管制往往是为维持社会经济的有效运转所不可能完全取消的。因此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当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而不应被直接非生产性利润的寻求者所影响，去保持和扩大行政管制的范围。这样做，只会增加寻租者取得租金的机会，招致加剧收入分配不公和社会资源浪费的后果。

^①这里说的非生产性，是指这类活动只创造利润不创造任何财富。

寻租理论和DUP理论的建立是本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政治经济学的一项重要进展。它的倡导者之一J·布坎南还因与此相关的贡献获得了1986年度的诺贝尔奖金。对于这样一种重要的学术观点，认真地加以研究的必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不仅如此，我们之所以需要重视这种理论，还因为它的某些论点和研究方法，对于科学地分析当前中国经济中的某些消极现象，寻找有效的救治办法，也会有所启发。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中，不平等竞争，“官倒”活动、“以权经商”，靠价差、利差、汇差发财的活动有所发展，由此引起的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已成为人们的“热门话题”。问题在于，在有关的议论中，就事论事的描述多，深入的科学分析少。议论中不乏义正辞严的抨击，但对问题的实质和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源却少有人能作出一针见血的说明，从而也很难提出有效的对策。例如，许多的人认为，上述种种现象都是引进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机制的必然产物；因此，虽然他们对这些现象的价值判断天差地别：有的由腐败之风蔓延推定市场化的改革方向是错误的，有的则争辩说，争夺差价，送“红包”，收回扣，就跟投机倒把、搞“公共关系”一样，乃是商品经济的通常作法，从而是市场化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不值得大惊小怪；但是，他们在都把上述现象同市场取向的改革联在一起这一点上则是共同的。就是一些认为应当制止这种倾向的发展的人们也认为，向国内外市场开放就自会在激发生机和活力的同时放进带菌的蚊蝇，我们只能靠道德教育和惩治威慑对它们有所抑制，而不会别有正本清源的良策。

可是只要我们认真地对上述现象的来由进行一番分析，就不难发现上述种种判断的不确切性。市场的基本秩序和基

本规则是平等竞争。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这些消极现象，显然不是来自市场规律的影响，不是“看不见的手”拨弄的结果。而是来自市场发育严重不良，行政力量对市场的管制。或如一位寻租行为的分析者所说，是由于“看不见的脚”踩住了“看不见的手”，导致国民经济各领域中巨额租金的形成，和上上下下各色人等对租金的角逐。利用价格等的“双轨制”赚取差价，从倒卖批件、额度、票证牟取暴利等等，正是典型的“寻租”行为。而那雨后春笋般建立的官商不分的公司，无非是些寻租的大亨。弄清楚了这一点，许多疑难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例如，我们听到不少企业经理人员抱怨目前“婆婆”太多，管束太严，占用了他们的时间与精力来应付“上边”的苛细要求；另一方面，又看到不少经理人员主动地进行“政治”活动，拉关系，找门路，立项目，开试点，争取给“特殊政策”，跑“部”“钱”进。从寻租理论看，这种矛盾现象是易于得到解释的。因为在租金广泛存在、人们普遍寻租的情况下，谁不主动地为争夺租金而奋斗，就意味着自身的利益受到损害。又如，进行价格改革的一种重要阻力，竟然来自某些从调整和放开价格中得到提价好处的供货部门，这曾经是一件人们困惑不解的问题。但当人们掌握了DUP的规律，也就顿时解开了谜底：保持行政管制，使部分人能够凭借特殊权力取得租金，对于有这种机缘的人们是最为有利的，这较之通过剧烈的市场竞争增加利润要省力得多。如果这一切都已经清楚，根本的出路也就易于明确了。这就是解除对微观经济活动、包括厂商价格行为的行政管制，放开价格，健全市场，开展平等竞争——这正是我们深化改革的基本方向。

当然，西方经济学中的寻租理论，是在与我国很不相同

的社会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历史传统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也有很大的差别。因此，我们不仅要借鉴，而且要创新。甚至不如说，借鉴是为了创新，目的在于发展自己的理论，解决自己的问题。

(1988年8月1日)

(原载于《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8年第5期)

关于中国腐败现象的研究*

〔香港〕 李南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腐败现象，完全可以按一般教科书定义的两个标准来衡量：(1)滥用公共权力；(2)为私人目的来滥用这种权力。不过，在西方发达国家，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有明确的区分，而在中国，这种区分经常是模糊不清的。因此，中国的“私人部门”可指个人、基层组织以及有集体性利益的工作单位。此外，腐败现象不仅包括严格法律意义上的腐败行为，如行贿和贪污，而且还包括准腐败行为“不正之风”。现有的理论似乎并不适宜说明这种腐败现象。例如，在极权主义模式中没有对腐败现象分析的理论，因为这种模式往往过高地估计了国家在总量控制和动员方面的能力和预期的结果。全国范围内纲领式的政策制定模式也无法对腐败现象作出解释，因为这种模式认为政策制定者是全知全能的，它不允许有任何偏差。官僚模式也没有提供对不良行为的充分解释，因为它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不现实的假设之上，即：组织具有充分的理性以保证手段的始终如一。但是，国家中心论观点的弱化并不能自动

* 李南雄博士系香港中文大学政治与行政学系系主任，本文根据他《共产党国家的腐败现象：对毛以后中国情况的研究》一文摘译。